王亚南的这本书与其说揭示了中国官僚政治的情况，不如说反映着中华全面衰微停留于中古时代，而走入现代的西方正蓬勃向上之时迷茫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所普遍流行的中国的文化的失望，与优越先进的西方两相比较，顿觉故国百般不是。不仅如此，进而认为，这种落后甚至有着两千年的根源，这种错误是一开始就有的了。于是乎，所谓的以现代的方法来研究，往往只能是以西方的历史逻辑、文化思维先入为主的给当时所呈现的落后之处下一个“千年以来便是如此”的定义，然后拿着答案找原因，倒果为因，对现有史料断章取义，曲解附会，用有色眼镜审查史料，只得到有利于结论的所谓“证据”。

话虽如此，也不能一概否决作者的本意，无可怀疑，这出自一种爱国之心，不希望她坏了，朽了，彻底没救了。引述分析的“历史真相”，与实际多有不合（只消提一点，即苏联的官僚主义，即可反驳作者关于官僚制政治的经济基础、内涵定义的诸解释，本书所释之意的主心骨也坍塌大半，其指导、借鉴的价值，便也无所依附了），但作者的出发点，所观察到的那令人丧气灰心的现状，无疑是真切的。但正如作者所说的，“须以极大的审慎来对待”，那么无不要求从真实可信的历史研究、中正客观的治学态度出发，何其难哉！一般情况下，往往也只有在文化上到了走出“中古”，才会有普遍的风气、普遍的自信来做这般（这又是怎样的悖论啊！），作者所处的境况与作者的见识，不足以支撑起来，这仍是无可厚非之事。

本书对“官僚政治”的研究大体上帮不到什么忙，这里不妨提下笔者对官僚政治的初步思考。将官僚政治视作一历史阶段，或一恶劣的情况，于增进理解无所裨益反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认知混乱。不如这般，暂时从具体的历史抽离开来，将“官僚政治”的含义，定义为现代政府管理模式所必然具备的特性（这里不计何时开始出现），并定义“官僚体制自主度”的概念。那些一般被视为“官僚政治”或“官僚主义”所带来的诸多弊病，如行政效率低下、贪污腐败、内部包庇，为“官僚体制自主度”高时所带来的灾害。现代政府中官僚体制不可避免，且一定有所损耗（熵增的泛化？），但严重的恶果只在“官僚体制自主度”处于较高水平时出现。至于如何才能维持低水平的“官僚体制自主度”，单纯的制度建设类的说法只是用新的一套官僚替代或监督旧的官僚，不动摇根本，则无济于事。需要的是，官僚制度外对官僚的监督与引导，这多半以“意识形态”的面目出现，甚至很大程度上无直接关乎意识形态本身（因为至今人类尚未提出一服务“官僚政治”为主要目的的意识形态），如西欧的民主，纳粹的第三帝国（确实如此），列宁时期的苏维埃，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政治。需注意的是，当这种信念只在口头上被宣传，而实际却不被普遍相信、实践之时，就失去了作用，勃列日涅夫的苏联即为一例。